振聋发聩：红山文化印象之八千年粟

□王 升

中国传统文化中，称国家为“社稷”，有江山社稷之说。“社”古代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日子以及祭礼。“稷”古代指百谷之长，因此帝王奉祀为谷神。《本草纲目》记载：黍乃稷之，黏者。《尔雅·释草》注为：稷，粟也。粟，即谷子，脱壳后称小米。可见粟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且有着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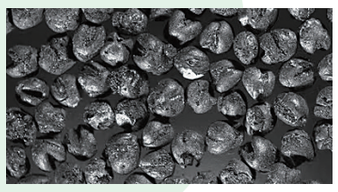
考古的三大课题是探索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敖汉旗历史悠久，地处燕山山脉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山坡地较多，北部丘陵起伏，小块平原较为开阔。据《明史》记载，敖汉曾是“沙柳浩瀚，柠条遍地，鹿鸣呦呦，黑林生风”之地。因此，敖汉旗是探索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较为理想的地方。2001—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文化中期兴隆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房址约37座，居室墓葬26座，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及文物标本。在对编号F31堆积层内和居住面上的土样浮选后，发现了大约1500多粒炭化粟。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将这些炭化粟和其他地方发现的炭化粟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兴隆沟的小米比陕西鱼化寨要早几百年，同时，与其他遗址的小米相比，兴隆沟小米形态更为完善。

之后，这一结论也经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验室进一步验证，经碳14鉴定后认为这些谷物距今7700—8000年，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小米种子，比中欧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由此说明，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应该是独立起源的小米，西辽河流域应该是小米的起源地之一。

作为我国重要的植物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通过实验室的分类和植物种属鉴定，发现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粟，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不论是年代还是种属鉴定都确定无误。而这些炭化粟在形态特征上所表现出的原始特性，揭示这些谷物很可能是当地栽培而成的。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刘歆益认为，根据糜子在驯化过程中失去自动脱粒功能这一驯化特征，对自公元前10000年—公元600年的一系列标本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发现小米从野生向人工种植的驯化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并非短期内发生的突变；从小米籽粒脱离层的性状可以确定，小米尚未脱离野生祖本，至今依然处于驯化进程当中。

赵志军认为，栽培作物的出现是环境、植物和人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西辽河上游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地貌环境的多样性和脆弱性，在不足10万平方千米的狭小区域内集中了山地、河谷、草原、荒漠、黄土丘陵等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地貌景观。这些特点不仅为小米野生祖本的广泛分布和进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进一步增强了它们单株种子多产的进化趋向，同时也对人类行为的改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下，人类的行为和植物的特性同时发生变化，在环境的继续影响下和改变后的人类行为的作用下，小米的野生祖本逐步地进化成为栽培作物。敖汉兴隆沟遗址关于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是一个非常缓慢且不断变化的过程。赵志军认为，作为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敖汉考古显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农业发展每两千年实现一次飞跃。



小米和碳化粟

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国祥长期在敖汉考古一线工作。他说：“长期以来，考古界对南方稻作文明有深入研究，而对北方旱作农业鲜少关注。事实上，旱作农业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有必要加强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延续。”借助兴隆沟人、动物和植物的稳定同位素数值的分析，考古专家发现小米在稍晚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主食。由此推断，虽然那时人们的食物来源仍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但原始的农业经济已经开始萌芽，炭化粟的发现也证实了距今近8000年前古人已经学会种植小米来食用了。兴隆沟遗址因此被学术界定为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旱作农业起源地。2012年8月，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02年，敖汉旗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环境500佳”环境奖。2012年8月，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敖汉享有“世界粟黍发源地”“中国小米之乡”“中国最大的优质谷子生产基地”之美誉。敖汉小米米色清新、品质纯正，属米中之上品，其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均比普通小米高，也高于大米、面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含量丰富而比例协调，维生素、矿物质元素的含量较丰富。

考古证实敖汉是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遗产地。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琼斯领衔的课题组研究发现，欧洲的小米应该是从东南亚通过欧亚草原通道传播过去的，考虑到兴隆沟遗址所处位置，其有可能是小米向欧洲传播的起始点。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所说，旱作农业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延续。 （五）

《卧牛望月》：饱含了作者对祖国、家乡和生活的热爱

《卧牛望月》一书是作者数十年来积累的诗词集锦，近四百首。诗集一共分为《华彩中国》《赤峰礼赞》《亲友情深》《工作剪影》《感事抒怀》五个部分，饱含了作者对祖国、家乡、亲情友情、新闻事业和生活的热爱。

作者孙百通是内蒙古赤峰市人，1963年9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原昭乌达盟（现赤峰市）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任编辑、主任、副台长（主持工作）、赤峰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处级调研员。1987年晋升为主任编辑，系全国广播电视学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记协、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赤峰市记协、赤峰市新闻学会副主席，赤峰市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

多年来，孙百通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高的领导艺术水平。打造出深受赤峰听众和观众喜爱的《您喜欢的歌》《一歌欣赏》《昭乌达歌声》《影剧院》《群众点播》等广播电视的名牌栏目。

从业多年，孙百通组织和指导编播人员采写录制了大量优秀广播电视稿件和节目，多次在国家和自治区级新闻媒体上刊播并受到各种表彰。由他参与创作的《田野交响曲》《绿色乐章》《山东半岛吹来的风》《整田整地真忙》等大型广播连续报道。《白音套海生产队大破“饱和”论》一文，在1966年1月31日的《内蒙古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在新的起点上前进》先后获自治区级各项新闻大奖；电视片《水涨船高》《风景这边独好》在央视播出，其中《水涨船高》获全国展播三等奖；科技风光片《百鸟乐园》在央视和美国一家电视台播出。

文艺广播开拓进取，再创辉煌。1981年底，孙百通参与赤峰电台第一部广播剧《盲厨师》的创作，作品在全国多家电台播放。大型文艺活动《田野欢歌》和《小康之路》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

诗歌创作笔耕不辍，乐在其中。褪去媒体人的光芒，孙百通还是一位钟情翰墨，独爱诗歌的文人。闲暇之余，用诗歌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多年来，他创作各类诗歌600多首，其中，由他作词的歌曲《勒勒车的风采》，在1990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全国广播新歌”评选活动中荣获金奖。

（王雅立）

勾云形玉器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
赤峰博物馆藏

初见勾云形玉器，脑中便开启了无尽的遐想……像云？像花？像兽？似乎都是，似乎又都不是。自1973年至今，勾云形玉器已经出土了30余件，它们的形象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将其誉为“玉雕玫瑰”，提出了“玫瑰说”，尤仁德、张永江认为它卷曲的勾角如祥云，提出了“云气说”；陆思贤、李缙云等学者认为它是动物的抽象体现，在形制上也有兽面形、凤鸟形、复合形等细微差异，由此提出“动物说”。

红山文化的玉器数量多，种类丰富，工艺精湛，题材广泛。这些玉器共分为十大类，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四大类，而勾云形玉器便是其中的代表性玉器之一。

赤峰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勾云形玉器由岫岩玉雕琢而成，玉体呈长方板状，上部对钻一孔成系，中间有一卷曲式的勾云造型，四角出边，玉体表面随线条之处有若隐若现的浅瓦沟纹，反面对应造型一致，从整体上看，它简练、饱满，又具有外扩的张力，将抽象和具象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视觉撞击力，充满了神秘气息。

勾云形玉器究竟是红山先民的随意之作还是具有其他特殊的含义？《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记载：黄帝“乘龙扆云”，意为黄帝乘龙骑云。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经过多年研究提出：“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只有黄帝时期与之相符。”

勾云形玉器，是蕴含龙、云、鸟、龟、花等多种事物的集合体，它的造型元素，充分展现了红山先民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力和巫觋的精神世界，在距今6000年前“王权与神权”合一的红山文化时期，出土于积石冢中心大墓的勾云形玉器不但是墓主人神权地位的象征，更是巫与天地万物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是“巫”话语权的重要象征物。

勾云形玉器作为红山文化的重器，目前已经被设计成赤峰博物馆的logo，成为了赤峰文化、旅游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记者 于红璇 通讯员 姝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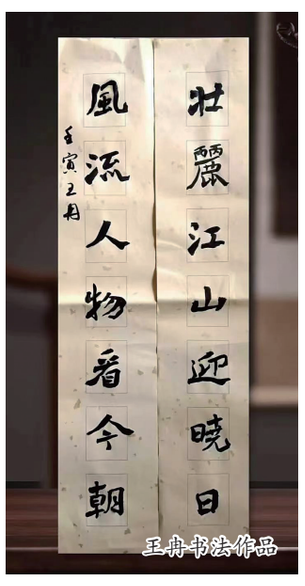
斯琴孟和制作箭筒。

传承技艺

巴林右旗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传承人斯琴孟和在制作牛角弓。 亚平 摄

横竖捺点是担当、成长、力量和希望

○于峰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冉真正懂得这句话是在他练习书法小有成绩并决定书法教学的那一刻。他是一位80后，中国硬笔书法家、内蒙古书法家、赤峰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曾连续多年在自治区、市级入展并取得奖项。

小学3年级的他，因为语文老师对其作业笔迹的肯定，萌生了最初练字的热情。后来，班级里的条幅、班会上的板书都是他把这种热情变成爱好坚持下来的理由。这一坚持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现在成为他一生的追求。

上学期间，刚刚开始练字的他并没有老师指点，就是自己在书店选择字帖，回家后一遍遍地抄写默练。不想笔法、握笔姿势，字势变化，进展很慢。参加工作后，成长起来的他虚心请教各地老师，勤临经典碑帖，特别对草书情有独钟，如东汉的张芝，唐朝的张旭、怀素，宋朝的黄庭坚，清朝的王铎等，通过对名家字帖的临摹研习，让他的书法得以进步，与此同时他还兼习其他书体，如魏碑、隶书、行书、篆书。

古代经典字帖临得多了，也渐渐懂得书道的高度和难度。书法作品的点画、张弛、姿态等都与作者的品德修养、情怀性格密切相关。正如颜真卿，因他的刚直不阿、浩然正气，才能写出豪迈雄浑的颜体之意趣。所以王冉也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精进书法、提升素养。

随着书法技艺的纯熟，接触、看到很多喜爱书法的孩子，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困难地摸索练习，甚至还在走弯路，他决定创办书法练字班，帮助那些热爱书法的孩子们，也要把书法好好地传承下去。

面对刚入学写字时常把笔压断的孩子，他耐心地教他们提笔方法、书写时笔的角度。面对书写不流畅的孩子，他又想办法调整他们的姿势，练习手腕发力，不能用力过大，怎样写好作文格，如何做到“上紧下松”“左收右放”，王冉把自己多年的习字经验历练总结的精华传授给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努力下孩子们的手轻盈灵巧，书写流畅了，也能把汉字书写在格子正中间了。

随着课余作业的增加，电脑阅卷、掌上词典等电子产品在家庭、学校的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孩子欠缺对硬笔书写的能力训练，而书法具有独特的视觉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作为21世纪新时代书法者，我们有责任传承并将这门古老的国粹艺术发扬光大，让其在当今社会文化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王冉说：“横竖捺点是担当、成长、力量和希望。”

国学拾萃

弘扬六德文化 塑造德善赤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东汉]王充《论衡·书解》

■原典

或曰：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经之实，传违圣人质……

答曰：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熟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

■释义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出自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王充一生尽力于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和目的论，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

王充自称“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作《论衡》之书。”他批判了“天人感应”说与谶纬迷信，提出“知物由学”“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他认为：“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草野：民间。意思是：房屋是否漏雨，住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是否有过失，老百姓最有发言权；经书是否有错误，诸子的著述中写得最明白。